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佟德钊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20年4月6日
总第83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本报讯 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古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创造能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引领，全国各地掀起“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走近《四库全书》”“册府千华珍贵古籍特展”“晒书大会”等古籍普及与传播活动的热潮，拉近了公众与古籍的距离，使大家能够近

各机构、平台找准着力点 创新出招拉近古籍与大众距离

距离感受古籍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图书“闭馆不打烊”，迅速采取措施，积极整合资源，从线下转到线上，从文字到音视频，各出奇招，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宣传推广古籍，努力发挥古籍抗疫力量。一些大众传播媒体、音视频平台也关注到古籍的重要性，发挥平台优势，参与到古籍宣传推广中。

国家典籍博物馆： 线上分享大量经典展览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纷纷闭馆。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宅家期间的文化需求，文博机构大力提供线上展示资源。其中，国家典籍博物馆将数期关注度极高、带来很大影响的经典展览搬到线上，截至3月底，已发布14期，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名家手稿”“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册府千华——珍贵古籍雕版特展”等，让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参观。

线上展览不受空间、展期的限制，可以保存并同时展示已经结束的展览，让错过展期的观众有了大饱眼福的机会。如今，

数字化技术日趋成熟，疫情期间，全国各地文博机构都推出了大量的线上展览，正体现了近年来数字化工作的成果。

河北省图书馆： 推出《典籍背后有故事》微纪录片

微纪录片《典籍背后有故事》以河北省各藏书单位保管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重要事件、著名人物的珍贵古籍为选材方向，重点突出史料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的代表性。首批选取了河北省内三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承德市图书馆）馆藏的6部代表性古籍，通过系列微纪录片的形式讲述古籍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疫情期间，已发布《崇厚使法日记》《坐隐先生订棋谱》《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坤輿全图》《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寒玉堂集》6种珍贵古籍的微纪录片，片中既有古籍原本展示、专家讲解，也有动画演绎部分，集专业性及普及性于一体，用生动鲜活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古籍的传承，拉近了古籍与公众的距离。

喜马拉雅、新浪微博： 打造“古籍唤醒计划”

3月18日，喜马拉雅正式发起古籍唤

醒计划，并联合新浪微博一同招募古籍唤醒人。3月18日—4月24日，以“古籍唤醒计划”为话题发布微博，分享对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或登录喜马拉雅APP，搜索“古籍唤醒”报名参加，即可成为古籍唤醒人。

喜马拉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计划以传承传统文化为主题，面向专家学者及爱好者征集作品。古代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史等相关专业硕博博士，出版过传统文化经典解读、古籍研究专著的学者，图书馆、博物馆、史志办、古籍类出版社等机构工作者，爱好古籍且对传统文化经典有专业独到研究的自媒体人等，均可报名参加古籍唤醒人计划。喜马拉雅将为古籍唤醒人提供全方位的扶持，如成为签约主播、一对一制作指导、版权保护、亿级流量扶持。

另外，喜马拉雅还计划与高校、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等展开合作，上线数百部古籍类专辑，建立全网首个音频古籍知识库，打造传统文化爱好者交流社区，让更多受众，尤其是年轻用户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迸发出更强劲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什么是脱酸



特邀嘉宾：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教授、古籍保护专家)

纸张脱酸是指通过添加碱性物质中和纸张既有的和未产生可能产生的酸性物质，以减缓纸张的降解，延长纸张的寿命。为达到脱酸目的，所采用的脱酸工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脱酸工艺必须对纸张酸碱中和均匀，碱性物质必须进入纸张纤维内部进行深度的酸碱中和，避免脱酸仅停留在纸张的表层，以及由此导致的脱酸后纸张再次返酸的情况。

脱酸结束后，纸内必须留有一定量的碱性储备（又称

为碱藏 Alkaline Reserve），以抵御来自环境影响或因纸张自然老化而再次被酸化。为此，国际标准《纸张脱酸过程的有效性》（ISO/TS 18344: Effectiveness of paper deacidification processes）要求脱酸工艺最后的碱性储备量不得低于0.5%。

纸张脱酸后的pH值并非越高越好。用于纸张脱酸的脱酸剂大多呈弱碱性，碱性过强并不有利于纸张脱酸。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纤维素材料在碱度高（pH10及以上）的环境下可能受损。例如，意大利禁止使用氢氧化物作为脱酸剂，因为过高的碱性可能诱导纤维素的β-烷氧基消除，随后发生纤维素解聚。特别是在碱性水溶液中，由于绝大多数纸张是亲水的，若采用强碱溶液去中和纸张中的酸，纸张中的纤维素可能解聚，水溶性的墨迹也会溶解。

纸张的颜色有可能会在高碱度下黄变，尤其是那些含有

木浆的纸张。

纸上的字迹，包括颜料、染料和油墨，在pH值高于10.0时，其颜色可能发生变化。

纸张脱酸后若能够保存在适当的环境下，有可能延缓纸张脆化的时间，但它无法改变酸性纸或被酸化纸的既有物理特性，如已经脆弱、破损的现状或已被损坏的物理强度、已被改变的白度等。因此，发现纸张开始酸化，若要保留原件的话，尽早进行脱酸处理才是正确的选择。对只需保留信息且已酸化的文献，可在其脆化前尽早数字化或缩微复制。

为了弥补单纯脱酸的缺憾，有人建议将粘合剂添加到脱酸剂，如甲基纤维素、淀粉或明胶，使这类粘合剂填充到纸张纤维的裂缝和被损坏的区域，加强纤维间的粘合，以恢复因酸化而脆弱的纸的强度，如耐折性和抗拉强度等。

尽早对酸性纸或酸化纸进行脱酸虽然具有延缓其使用寿命的作用，但并非所有类型酸性纸或酸化纸都可能选择脱酸，

需要特别注意：某些类型的纸张是不宜脱酸的，如涂层纸等；纯木浆纸在碱性较高的脱酸剂作用下，脱酸后有可能变色、变脆或更易被撕裂；某些颜料或染料在碱性环境中有可能褪色、变色或洇化；酸化后已经发脆或形体脆弱的纸，可能经受不了脱酸的处理过程，无论是喷洒或是浸渍处理。

脱酸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使某些酸化文献不宜脱酸。因此，无论采用什么脱酸技术，都要做脱酸处理前的脱酸对象筛选。尽管脱酸处理本身的成本并不高，但脱酸的前处理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这是脱酸难以得到大范围推广的原因之一。因此，制定简单明了且易行的脱酸对象筛选标准是极为必要的。

脱酸的主要对象是尚有一定强度的酸化纸，脱酸可使这类酸化纸的文献原件得以保留。对纸质非常脆弱的酸化纸，若必须保留原件，只能修复完整后进行脱酸。日本同行指出，对于尚可脱酸处理但形体受损

的脱酸对象，如被磨损、有裂缝、被撕裂或纸页脱落以及虫咬鼠伤的纸质文献，首先要进行修复。即使纸张变形也需要使其平整后才能脱酸，如有皱折、波纹等的变形纸张。在对纸质文献进行整体脱酸时，凡是有金属装订的建议改为麻类绳线装订，因为金属会被碱性物质腐蚀。

由于脱酸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对于极为重要的文献，为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丢失风险，在脱酸前最好制作高质量的复印件，以确保原始信息万无一失地被保留。

脱酸也并非万灵药，那些纸面上固有的问题，如墨渍、污损、变色、褪色等，均不可能在脱酸中解决。也不要企图通过脱酸，使已经脆弱的纸变柔韧，已经受损的纤维仅通过脱酸是无法被修复的，特别是木质素含量多的纸张，脱酸并不可能移除木质素或使纸纤维变长。



众说

在静嘉堂文库感受宋元珍本

高旭日：

静嘉堂文库由岩崎家族的岩崎弥之助（弥太郎之弟）创立。岩崎弥之助从明治二十五年（1892）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到明治四十年（1907）购得陆心源藏书后一夜崛起，成为举世皆知的大藏书楼。静嘉堂文库在收购陆氏藏书之前，其库藏只有三万余卷，后收入陆心源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 4146 部 43218 册，才构成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后来岩崎弥之助及其子岩崎小弥太还购入岛田篁村、竹添井等明治时期著名学者的藏书，使静嘉堂文库所藏汉籍无论质与量均称一流。大正十三年（1924）静嘉堂文库在现址建馆，并把藏书公开。1948—1970 年间，该文库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后复改为独立机构。

我们此行受到静嘉堂文库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进入阅览室，我努力抑制激动的心情，见识到了几件国宝。宋宁宗时代刊本《三苏先生文粹》，大字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八字，每页三百六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记刻工姓名，卷中避宋讳“桓、构”等字。静嘉堂文库所藏汉籍中有十八种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其中《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为世间独一无二之珍本。我们此次见到的即为此本！二百余年间，这部《三苏先生文粹》五易藏主，皆当代名家，可见其宝贵。静嘉堂文库另藏有一种古本《唐百家诗选》，卷中有清代大家何义门手识文三则。据此则知这部《唐诗百家选》乃是宋敏求所编，

王安石删补而成。该书原为明人毛晋所有，后归清人汪士钟收藏，经陆心源函索来，而终为静嘉堂收入。

时间有限，只看了几种珍本，但已觉得幸甚至哉。

奚淳铖：

静嘉堂文库所在之处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风过之处银杏叶纷纷落下的景象像童话故事里的情景。在这儿，我们遇到了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女士，之后的几天我们也有幸一路同行。

静嘉堂文库的工作人员成泽麻子提出了十几种宋本，让同学们大饱眼福。我看到的第一本是用洒金纸包背的《尔雅疏》十卷，此本为函宋楼旧藏，装帧形式为蝴蝶装，打开后才发现是原装的公文纸本（用公文纸的背面空白处印刷而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公文纸印书的情况。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说文解字》十五卷亦是函宋楼旧藏，黄色虎皮纸书衣的金镶玉本。宋本用竹纸的情况非常少，而这就是一本竹纸的宋刊本，该本曾经修复过，并且还补了栏。最有趣的是，该书抄配一页，纸有染色，版心有注释“此叶醉经轩蔡氏用土礼居所藏北宋小字本影钞补”，透过这样的细节，我们能考证其版本情况。函宋楼旧藏本还有宋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三十卷、《咸淳重修毗陵志》残存十四卷、《昌黎先生集》残存十卷、《白氏六帖事类集》三十卷等，其中《昌黎先生集》为毛抄本，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裴 震：

静嘉堂文库由在日本实业界被称为“三菱的灵魂”的岩崎弥之助于 1892 年创建。创建初衷是岩崎弥之助要为恩师重野安绎编辑日本国史收集资料，因此建立之初，是由重野安绎出任文库长。

静嘉堂文库目前的藏书量约为 20 万册，其中汉籍 12 万册，最重要部分是来自中国湖州陆心源的三大藏书楼——函宋楼、十万卷楼及守先阁的全部藏书 4146 种，合计 43218 册。我们这一次提出来的书都是其中比较珍贵的部分。可惜的是，因为书目较多，我们第一组进去只看了一半不到，最珍贵的《锦绣万花谷》没有能够看到。但仅看到的这几部，就足以让我感到震撼。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黄丕烈跋《周礼》，卷首有黄丕烈“百宋一廛”印，卷末有其手书跋文，叙述该书流传过程，不禁让我感叹“人虽百岁，书可千年”。这些珍贵的古籍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正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将这些珍宝传承下去，让子孙孙还能有机会看到。成泽女士也反复和我们说，希望通过保护修复，将静嘉堂的藏书延续下去。

李 雪：

静嘉堂文库现在的藏书量为 20 万册，其中汉籍 12 万册、日本古籍 8 万册。由于阅览室有人数限制，所以我们分两批进去阅览。我第一批进入阅览室，那边有早为我们准备好的供阅览的书籍，所见有宋版《三苏先生文萃》《周礼》，均为大字本，

书衣为蓝色绢面洒金，在翻阅过程中还发现了第二任文库长亲笔书写的便签，大意为此书最好不要再碰。《南华真经》是金镶玉的蝴蝶装，刊刻精美，版心上有大字、小字的字数，版心下有刻工的姓名。《吴志》老化比较严重，黄褐斑面积很大，中间夹有一张白皮纸。《大宋重修广韵》的书衣增加了一层无酸纸，发现原来对其进行修复时采用了书画修复的方法，直接托了一层纸上去。《尔雅注疏》的护页为宋代白麻纸，书中描述道“封面为宋白麻纸，稀世之物，较宋版书画更不可得”。此书曾经被改装过，后面批注的字被挡住了，书中发现有用公文纸印的部分。

贺钰偲：

在中日两国近代文化史上，“静嘉堂”这一名称，向为学者所瞩目。它在日本是除宫内厅之外，收藏汉籍宋元古本最为丰富的文库。作为日本三菱公司的一个文化机构，静嘉堂文库由三菱的“灵魂”岩崎弥之助（三菱第二代社长）开始筹建，至岩崎小弥太（第四代社长）时才得以最后完成。静嘉堂文库藏有 20 万册古籍，其中 12 万册为汉籍。它现今所收藏的 1180 余种汉籍善本中，有宋刊本 120 余种，元刊本 150 余种，明刊本 550 余种，明人写本 70 余种，此外，还有清代名家朱彝尊、顾广圻、黄丕烈等人的手写本和手识文本 260 余种，实为汉籍版本的无价之宝。这个下午，我们看了很多宋本，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唯一可惜的就是不能拍照，只能把宋本之美留在心中。

梁平二元纸：不该只秀了年画

□浙江 汪小帆

重庆梁平的造纸历史悠久，其延绵百里的竹山盛产百夹竹，为生产本地特有的二元纸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一直以来，二元纸是作为梁平年画的载体“唱主角”的，而用其他普通竹类所生产的纸，只能用作鞭炮外衣纸或祭祀纸类（黄表纸）销往国内外。我想，这大概就是郭主任一直提到的品种和销售渠道单一的原因吧。

小车奔驰在去七星镇的高速路上，原本需要走上两个小时的土路，因为有了高速公路的更新换代，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车上，梁平方面接待我的文老师给我介绍了相关情况：梁平的造纸历史悠久，其造纸村落大多是以家族、同姓聚居而形成的，并向四周分散辐射了各类大小作坊。听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勾勒出的画面是：梁平会像其他地方一样，各种作坊星罗棋布，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我慕名而去的又是 2009 年被评为第二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法造纸技艺传承人的蒋师傅家，更觉此次考察很值得憧憬。

谁知道，文老师接着告诉我，由于近年来纸张生产排污严重，又得不到合理的整治，当地政府便采取了一刀切方式，取缔了很多手工纸作坊。“整个梁平现在应该也只有蒋师傅一家在做了吧。”文老师的语气有点游离，又补充了一句：“保留这家，也是为了梁平年画的发展，毕竟梁平年画全靠他们提供的纸张。”说完，车上一片沉寂，大家恐怕都在替梁平手工纸发展的前景担忧吧？

蒋师傅的纸坊与村道隔着一条小溪，需要下车沿着土坡爬下路基，踩着溪水中散落的湿滑的石头，才能进入作坊。在此之前，根据经验，我想象过纸坊会有些破旧，可没想到的是，竟然破败到了让人不敢迈步入内的程度：只见迎面四间土房，歪歪扭扭斜倚在那里，白色石灰泥抹的墙面大部分已斑驳脱落，里墙的原材料竹篾露了出来，木条框打格的窗户没有玻璃，甚至也没有挡风的塑料膜。抄纸的作坊内昏暗潮湿，大白天都得靠一个悬在梁下的灯泡照明。屋里最显亮的墙上，高高地挂着蔡伦画像，紧挨着的就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法造纸技艺”的牌子。屋子正中，是一个巨大的

石头水槽，颇有年头，放着春捣用的石臼以及踩浆用的石凼。而我曾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力压榨的工具——一根两米长的粗杠子，正倚靠在墙边，旁边还有一大坨手腕粗的麻绳正在“歇脚”，似乎在默默地告诉我们：古老的传统造纸工序，就靠我们延续着、维系着，长年如此，真有点儿累了。

在另一间焙纸用的土房里，我看到了一直想见但始终没有见过的土焙。土焙内部由钢筋搭架，绑以竹子，披上竹篾，外砌石灰料，并拌上纸筋而成。每过半年，焙墙都要用桐油、蛋清、盐、米浆调配后刷一遍。可是，听上去工艺如此讲究的焙墙，真的见到却让我有些小小的失望。先它外观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光滑、细腻与湿润，而且连平整都做不到，甚至从焙墙侧面看，还是波浪起伏的。我难以想象，在这样的土焙上刷出的纸张，纸面是如何做到“细而薄，柔韧而不脆，遇水后不卷不皱”的呢？走过这么多纸坊后，我已经学乖了，决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为何不把这个用了二十多年的土焙重新彻一下或者修整一下呢？因为我明白，对于利润微薄甚至会赔本的作坊来说，花上一万



多的真金白银做一次焙墙，根本是个天文数字，而当下焙墙工匠的稀缺，也让他们心安理得：聊胜于无，维持现状。

我对作坊外观的不堪心有戚戚，未免“为民请命”，向文老师建议，县里是否可以用非遗专款将作坊修缮一下，以改善操作环境呢？文老师指着破屋墙上挂着的一块牌子告诉我，挂着这块牌子，他们就无法染指蒋师傅的房子了。我凑近一看，但见牌子上写着“重庆市梁平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蒋集文土法造纸作坊”，我愕然而退。

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原因，我并没能观看蒋师傅的榨纸工序，略带遗憾地离开了作坊，前往梁平区屏锦镇，参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木板年画。传承人徐老师告诉我，他制作年画用的纸张都是从蒋师傅处采购来以后，再经过自己

专门加工后而成，故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梁平年画。我想，在梁平木板年画这一艺术品上，蒋师傅和徐老师是相得益彰、相互成就的。随后，我又寻访了梁平城内的竹帘画作坊。据说，竹帘画源起于吕纸的帘子，所以说吕纸、年画、竹帘画可谓一脉传承，但世人只知年画、竹帘画，却未必知道梁平二元纸，何故？遂心有不平。

梁平的访纸行程，不是结束于看竹帘画，而是结束于与郭主任的道别。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之进行交流，他则把自己收藏的一大堆当地文献古籍摆出来给我看，他相信，这些文献应该都是用传统的梁平纸印制的，也希望梁平二元纸能够恢复到当年的全盛状况，可以用来印刷书籍，充当修复材料。我感慨于郭主任的乡梓情，慰藉于梁平人的执着心，更寄望于梁平二元纸的新生。



南京图书馆“古籍抗疫”： 借力数字化成果有序推进读者服务

成果丰硕，大量数字化古籍
在阅览服务中流通

古籍的数字化是各大图书馆着力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近年来，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一直坚持开展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化工作，并且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总量丰富且精品多。目前，南图已经完成数字化的古籍有近万部、3万余册，另有民国文献2万余册，总量达170T。根据善本为先的数字化原则，已完成数字化的珍贵古籍有6000多种，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善本基本可以做到不出库。其次是大量的稿抄本，南图馆藏以八千卷楼为基础，而八千卷楼藏品中又以稿抄本为其特色。这些稿抄本数字化后的一个极大便利，就是能利用图像软件的放大功能，将原本都难看清的蝇头小楷放大数倍阅览，保证古籍利用时的准确识别。

影像化质量高。南图制作的数字化古籍均使用TIFF格式，这是目前业界较为流行的高位彩色图像格式。与JPEG不同，TIFF文件可以编辑后重新存储而不会有压缩损失。这也表明，南图数字化古籍的保真程度更高，对于古籍细节处的展现更加细腻。国内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像数据库中的图像多是二值图，虽然对于内容并无太多损伤，但是古籍细微的妙处就难以尽窥，且对于套色、朱批等有色彩的文本难以表现。目前较好的全彩制作的

预约，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为读者提供最大可能的方便。

闭馆不闭网，大量数字资源供读者居家访问

南图积极参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活动，自主建设、发布了“清人文集全文影像”“稀见方志全文影像”两个数据库，前者为馆藏100部清人文集，涵盖清初至清末各个时期，书品整体质量较高，标引详细；后者收录了馆藏珍稀方志20种28册，内含不少名家题跋，十分珍贵。读者只需登录南图官网即可使用。

此外，南图馆藏民国连环画、红色记忆图片数据库，中国近代文献图像数据库，中国古代体育图片库，抗日战争历史图库，百年人物图片数据库等均可在线访问。南图还有丰富的外购古籍资源，其中“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及“全国报刊索引”可提供馆外访问，读者在南图官网首页输入阅览证号及密码后即可查阅各类古籍全文及晚清至民国报刊目录索引。网上展厅还提供了30余种图文展览资料，内容

涵盖经典名著、古籍珍本、节庆民俗、地方文献、重大历史事件等，读者足不出户即可观展。

闭馆不闭服务，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闭馆期间，图书馆安排专人值班。读者依然可以通过电话、公众号和微博等方式进行文献咨询，由工作人员负责解答，并提供相关的文献传递服务。“阅闻”公众号持续更新，每周三推出一期“国学图书馆善本题跋”，另有电子资源介绍、图书馆导览等内容不定期上线。

南图承接的国家图书馆调研项目“公共图书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撰写，并根据疫情期间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下一步，将主要致力于调查问卷的设计，逐步开展针对业内外相关单位及普通读者的网上专题调研活动。

为了防控疫情，工作人员定期对阅览室及库房进行消毒，保持馆内卫生，为恢复开放做好了准备。

（文/南京图书馆史宇宇）

南京图书馆是江苏省省级公共图书馆、国家一级图书馆。历史文献是其馆藏一大特色，现有古籍160万册、民国文献70万册。2008年被文化部评为全国首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一直以来，南京图书馆非常重视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尤其是近年来坚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取得了大量成果，为读者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南京图书馆闭馆不停服务，充分利用已有的数字化资源，发挥线上平台的优势，持续为读者提供古籍服务。



册府撷英 兰台吐蕾 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战“疫”纪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福建省图书馆（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迅速采取行动，以阅读推广为主线，利用新媒体平台创设了“阅读战‘疫’”主题板块，包括“文化记忆”“网上文旅”“网上读书”“网上讲坛”“网上展览”“馆藏珍本”“兰台书医”和“科学防疫”等12个栏目，在官方微信及微博平台上坚持每日更新，为居家防疫的广大读者提供各类科学文化信息服务。其中，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和作用，以线上开展古籍珍本介绍和推广、线下配合联防联控为着力点，齐心协力为此次抗疫工作尽职尽责。

勇敢战“疫”，冷静应对——建立战“疫”工作组

1月23日，根据福建省图书馆（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部署，特藏部（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组建了“党员干部战疫工作小组”，承担起部门有关的战“疫”工作。

2月2日，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建立了“党员干部战疫工作群”，及时沟通有关信息，快速响应馆方的工作部署。一方面，做好防疫期间岗位轮值，勉力维系基础工作；另一方面，配合福建省大型史料丛集《八闽文库》的编纂工作需要，针对所需馆藏古籍开展了数字化加工与校验，完成《说文解字》《秋坪老人日记》等稿抄本的扫描采集千余帧。此外，还依托福建省图书馆资源体系，负责解答社会各界对古籍和地方文献的咨询。

智慧战“疫”，兰台芬芳——开展特藏与保护宣传服务

在做好每日员工健康管理情况登记汇报工作的同时，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积极响应馆方“阅读战‘疫’”的有关安排，组织业务骨干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编辑素材，撰写文稿，在官微平台的两个专栏里接续推出系列文章，其中：“馆藏珍本”系列推出《闽

图藏北宋刻本《大威德陀罗尼经·卷四》《三山刻本归三山——摭谈馆藏元刻大板《通志》》《救荒良物话金薯——清乾隆晋安陈氏刻本《金薯传习录》》《海滨余馥延幽遐——明末祁氏澹生堂抄本《瀛涯胜览》》《模楷百代户户藏——清初拓本《多宝塔碑》》《龙天护持孤志存——明万历刻本《南泉慈化寺志》》《文生于情有春气——清云左山房抄本《林文忠公抄集楹联》》《百部虞初救世心——清光绪福州刻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王真迹几人传——《玉枕兰亭序玉版十三行合册》》和《山水奇趣毫楮间——明天启抄本《下帷纂》》共计10篇文章，基本涵盖了福建省馆藏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珍本，其中北宋元祐福州刻本《大威德陀罗尼经》（存卷4）及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本《通志》（存卷69、164）分别是2013年和2019年采进的闽版珍契，极大提升了福建全省古籍典藏与研究水平，尤为宝贵。

“兰台书医”系列推出《〈重

修忠懿王庙碑铭〉修复记》和《馆藏〈天妃灵应之记〉拓片修复略记》两文，主要回顾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福建传习所举办培训班的主要修复成果，展示并探讨了拓片修复技艺，同时还介绍和揭示了这两件稀见拓片的历史渊源。在流畅的文笔下，这些略显生冷的修复专业技艺变得通俗易懂，更接地气，深受读者喜爱。

春蕾绽放，清新亮丽——线上推送获读者大赞

近些年，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在开展福建省古籍保护事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专业队伍，他们在古籍普查登记、编目审校、文献数字化、研究整理与出版，以及古籍采访、古籍修复与传拓等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自2011年起，迄今已先后整理出版了《册府撷英——福建省图书馆藏珍品集萃》《福

建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志丛刊》及《闽茶文献丛刊》等十余部图籍；同时，积极寻访古籍特藏文献，先后为福建省馆采进了自宋至清历代版刻古籍；工作人员不断加强交流和学习，夯实了业务基础。

在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及办公室老同志的指导和带领下，这群富有朝气和敢于拼搏的年轻人，在此次抗疫行动中充分展现出了敢战、勇战和智战的精神风貌，其编撰的古籍特藏文献暨修复保护推文甫一推发，很快就受到省内外读者的热情捧赏，大家纷纷表示“古刻名抄曾经眼”。另外，此举在业界同行中也得到了充分肯定，青海、湖北等省级图书馆也在疫情期间为广大读者推介善本珍拓等馆藏珍品，由此形成了战“疫”时期公共图书馆特色文化服务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成为战“疫”时期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工作的一大亮点。

（文/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

一个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古籍保护情怀(上)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序

□程焕文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和特藏工作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巍巍然蔚为南国历史文献收藏、整理、保护和研究之重镇,令海内外瞩目和羡慕。回顾近 20 年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与特藏工作,有艰难困苦,更有美好记忆,的确有许多值得书写之处。

触目惊心的古籍保存状况

1998 年,学校任命我担任图书馆馆长时恰逢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进入热潮时期,标志着中国高校图书馆迈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刚刚启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数字图书馆的美好憧憬之中。我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全面巡查图书馆,每个角落都不放过,感受最深的不是图书馆在自动化和网络化方面与时代发展有多大差距,而是馆舍条件过于简陋,所有书库都没有空调设备,藏书长期处在自然状态下,饱受潮气侵袭,老化、霉变和虫害十分严重,全馆仅有的几台单体空调机装在了电脑机房,机器比人和书更重要、更需要空调的情形深深地触痛了我这个爱书者。在巡查民国书库时,看到大量泛黄的书籍报刊已经脆化,不能触碰,令人惊心动魄;眼见大量古籍被虫蛀得像筛子一样,又因长期遭受潮气侵袭而粘连以致难以揭开,我心如刀绞;特别是在巡查善本书库时,看到 1927 年顾颉刚先生从江浙采购的 3 万多件碑帖拓片堆放在几个大书柜内,70 年来无人整理,还有半书柜的碑帖拓片因在抗战迁徙途中被雨淋过早已霉变板结,成为一块又一块难以揭开的黑砖头,伤心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深感愧对先人,愧对历史,愧对文化!作为一馆之长,一种油然而生的历史责任感腾然升起,由此开启了我 20 年来始终把古籍工作作为图书馆工作中之重的历程。

那时高校的经费普遍拮据,虽然学校为了安抚我(因为我起初不愿意接受馆长任命),在整体经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将图书馆的年度经费预算由 150 万元增加到了 350 万元,但图书馆的经费仍然捉襟见肘,只能维持教学所需文献的采购,无法再有所作为。我似乎又陷入了与各位前任馆长一样想作为而无法作为的恶性循环中。好在我出任图书馆馆长时年仅 37 岁,血气正旺,“匪”气十足,想做点事就一定会想办法做成,否则不会死心。

2000 年,在美国岭南基金会主席牟锐(Douglas P. Murray)博士率董事会成员来中山大学例行访问时,我几乎是声泪俱下地陈述了抢救和整理馆藏碑帖拓片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用个人的历史情感和文化情怀深深地打动了基金会的各位董事。于是,美国岭南基金会同意捐款 15 万美元(相当于 100 多万元人民币)支持图书馆的碑帖拓片抢救与整理工作计划。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大致相当于图书馆一年经费预算的一半。正是这笔捐赠款在近 20 年间一直发挥着“种子”基金的作用,让我敢于做高薪聘请已退休的校外专家到校任职等很多事。后来又通过其他渠道不断往这个经费池灌水,涓涓细流迄今尚未枯竭。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成果

我始终认为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馆,最重要的是文献资源建设。没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会是无米之炊、无源之水。在文献的采访工作中,一般图书的采购通常不是一件困难的



事,有了经费,依照“三目”画购选书即是。可是,历史文献的采购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很多时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访书特别重要,一个馆长如果不懂得访书,那基本上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我始终认为:采购图书是采编部的事,访求图书是馆长的事。因此,近 20 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展历史文献的收集,通过募集、捐赠和采购,先后建立了多个系列的学术文化专藏:

一是学术大师专藏。起初,中山大学图书馆仅有陈寅恪教授藏书一个专藏,后来陆续增加了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以及梁方仲、戴镗龄、金应熙、李新魁、端木正、叶汝贤、吴宏聪、李锦全等多位教授的藏书,累计访求个人捐赠藏书超过 20 万册(件)。

二是民间历史文献。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手资料的占有。国内最早的徽州文书研究者 of 中山大学梁方仲教授,其研究向为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重点,徽州文书的收集自然成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重点工作之一。近十年来我和同事经常深入黄山市搜求,已累计购买徽州文书 39 万余册(件),约占全球已知徽州文书收藏总量的三分之一。贵州水族的水书亦是中山大学教授在抗战西迁云南时所发现并最早开展研究的,学校人类学系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设有“水书研究基地”,我亦曾深入黔南,累计从民间收购水书 1000 余册,我馆成为贵州以外水书收藏较多的单位之一。此外,侨批是广东的地方特色民间文献和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我馆亦购买过数千件。

三是外文文献特藏。中国图书馆界的外文文献收藏向来稀少,有外文古籍特藏的图书馆更是凤毛麟角,这乃是中国图书馆与欧美图书馆的重大差别之一,也是中国图书馆的文献收藏缺乏多样性和国际性的表现。为此,我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建立起了中山大学的外文文献特藏,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整体捐赠的喜乐斯藏书、美国友人捐赠的陈纶绪藏书、美国加州大学捐赠的 UCLA 藏书,通过专项经费从奥地利采购的马恩列斯毛和孙中山手稿特藏、从美国采购的埃塞俄比亚古抄本、从英国采购的英国文学专藏,以及从美国采购的西文、印刷史和图书史特藏(其中包含近 10 种 16—18 世纪古本)等,累计 30 多万册(件)。

四是碑帖字画器物。近 20 年来,从各种渠道收集了一批碑帖字画,包括邹永、邹芳、邹达捐赠邹鲁校长与夫人赵淑嘉信札字画(约 500 件),与丹霞山管委会合作捶拓丹霞山石刻拓片(近 500 件)等。

五是石刻造像墓碑。我通过挖掘传教士梁发的墓碑线索,从康乐校园废弃的旧构筑物内发现并收回了 20 世纪 30 年代学校从北京琉璃厂购买、在“文革”时期封存,其后一直无人知晓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石刻、

墓碑和佛教造像近 20 件。

20 年间,在我的馆长任期内,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增加了 100 多万册(件),这些学术文化专藏的建设为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构筑了深厚宽广的学术资源平台,在未来将持续嘉惠学人,福泽学林。

得人才者得天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图书馆古籍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我接任图书馆馆长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人员正处于严重不足的时候,工作毫无生气,远远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采取非常措施,全面建设古籍工作人才队伍。

一是高薪外聘资深古籍专家。自 2002 年起开始在国内外寻访退休的古籍专家,先后聘请辽宁省图书馆古籍编目专家韩锡铎先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女士、故宫博物院碑帖鉴定专家施安昌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整理专家沈津先生等陆续到馆任职,短者任职三五年,长者任职十余年,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一代新人。

二是大力招聘博硕士毕业生。1998 年我担任图书馆馆长时,全馆只有两位硕士毕业生,一位在采编部,一位在参考咨询部,本科毕业生也只是一二十个,其余大多为专科生和工人,古籍部的人员学历结构自不待言。通过与学校多方沟通,陆续招聘了一批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建立了一支 30 余人的古籍整理与服务的青年专业人才队伍。与此同时,于 2001 年派遣副馆长林明博士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访问进修一年,为组建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做前期准备。在特聘专家潘美娣女士到职后,从馆内抽调肖晓梅等馆员专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并以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方式从社会招聘字画修复师李景文入职,从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古籍修复专业招聘中专毕业生若干名,组建了最初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

我虽然能够以一己之力撬动学校的权力资源以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方式招聘一批低学历的古籍修复人才,但是,学校的人事制度摆在那里,工资水准和职务晋升同样障碍重重,总是突破人事制度的规定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决意动员有文史背景的高学历馆员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其后张珊珊硕士、邱蔚晴硕士等陆续加入古籍修复人才团队,这大概也开创了我国图书馆界硕士毕业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先例。如今,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具备博士、硕士、学士等多个学历层次,具有从事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和文献保护研究与教学的能力。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高校的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以及国家级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传习所,中山大学图书馆不仅广纳良才,在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上,近 20 年来也一直处在全国领先地位,为国家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卓越贡献。

自 2003 年起,我馆便开始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合作,开展西文古籍修复培训,其后与中国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十多年来每年从德国、美国聘请古籍修复专家前来中山大学开展为期一个月左右的西文古籍修复人才培训。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和高级研修班,不仅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锻造了一支崭新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而且为全国培养了数百位西文古籍修复人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以后,中山大学图书馆还承担了不少中文古籍修复人才培训任务。

鉴于全国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学历结构偏低,职务晋升和专业研究明显处于劣势,且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古籍修复专业,不利于古籍修复与保护事业的发展,于是,我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出共同开办古籍修复专业硕士班,此议正中张志清副主任的下怀,大家一拍即合,以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的学科平台为基础,于 2015 年率先在全国开设文献保护与修复专业硕士班,把全国文献保护与修复专业的教育层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作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学学科带头人,我又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在学校实验中心建立 300 平方米的文献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供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文献修复、图书史、碑帖修复等专业课程和博雅课程实习使用,有效地普及了古籍整理和文献修复的知识与技艺,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

古籍修复技艺虽然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决不能成为被抢救和保护的对象,而应该成为广泛普及的专业才能。因此,构筑古籍整理和文献保护学术交流与研究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贡献与成就值得称道:2012 年起,连续举办四届“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广邀世界各国中文古籍整理专家和民间古籍收藏专家开展古籍整理学术交流与研究;2016 年,主办“古籍保护与修复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古籍修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西文献的保护与修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学术影响;另外,自 2012 年起每年主办“古籍修复华南论坛”,迄今已主办 16 届。

令人欣慰的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青年才俊在近十年内相继主持和完成了 20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广州市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著作,有效地将工作成果转化成为学术成果,有力地提高了图书馆的学术地位。

因为具备这些优良的学术基础与条件,2017 年我牵头整合中山大学图书馆和资讯管理学院的研究力量在学校成立了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形成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三足鼎立、共襄中华古籍保护盛举的局面。(本文小标题乃编者所加。作者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